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与 中国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BEIJING DAXUE ZHONGGUO JINGJI
YANJIU ZHONGXIN
JINGJI XUE YU ZHONGGUO
JINGJI GAI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陈敬山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5 字数 270,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2074—4/F·450

定价 17.00 元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编委会

林毅夫 易 纲 海 闻
张维迎 张 帆 余明德

编委会负责人：

易 纲

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1995年3月10日正式成立。作为成立庆典的一部分,中心在1995年3月6日到9日举办了长达一周的经济学新发展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系列讲座。在中心成立大会上,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诺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讲演。吴敬琏教授对诺斯教授的报告做了“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为题的评论。本书汇编了诺斯教授的讲演、吴敬琏教授的评论和十六篇系列讲座报告,献给读者朋友们。

192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的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前辈出席了中心成立大会并作了“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的即席发言。陈岱老欣然同意用他的发言作为本书的前言,并在1995年5月4日专门为本书前言签名。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中心成立大会的讲演及中心简介收在本书的附录中。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海内外各界朋友对中心的热情关怀和支持。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美国商会国际民营企业中心(CIPE)和诺曼基金会对本中心成立庆典活动的支持。

易 纲

1995年5月29日

前言：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有幸参加这个盛会，请允许我首先对这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致以由衷的祝贺！组织会议的同志让我讲几句话，我有点迟疑，因为在座的有这么多的嘉宾，大家一定更愿意听他们的讲话。而且无论我讲什么东西都是老生常谈，不愿意因此而耽误同志们的时间，但是组织者的盛情又难却，方才听了两位的讲话（指吴树青校长和林毅夫主任），我有点启发，我想就此讲一点常谈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界曾经有一个类似口号的东西，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努力的结果并不是十分的理想。本来嘛，这个经济学的发展从历史上说就是一个理论跟实际联系的过程，时代变了，经济实际变了，就一定会反映到思想方面来。如何了解这种实际，分析这种实际，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理论的问题，有了这个理论之后，我们反过来由理论又来解释实践，而实践又是由理论来指导的实践，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的。今天，尤其我们中国处在这个时代，变动很大的时代，一定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

决这些新的问题，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经常想，经济学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致用之学，作为致用之学就是一定要跟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的。“经济”这两个字，西方的翻译就是经济学、经济的，据我所知，是开始于日本，我们把它引进到中国来，但“经济”这两个字确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名词。我们过去讲经济就是“经世济民”，那么从这个“经世济民”就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空虚的、抽象的理论，而是联系实际的理论。古代就已经如此了，现在我们更应如此。我希望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这方面能够多做一些工作，以弥补我们过去所失去的时间。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岱孙

一九五五年五月廿日

目 录

前言：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

-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
的讲话 陈岱孙(1)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
的讲演 道·诺斯(1)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 对诺斯教授讲演的评论 吴敬琏 (11)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的发展 林毅夫 (17)

中国经济转轨对现代经济学提出的问题 易 纲 (56)

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市场上层组织和经济发展

- 的关系 周其仁 (64)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 栗树和 (76)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海 闻 (90)

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 张维迎(112)

规制理论与实践 张 帆(154)

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 余明德(171)

制度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 盛 洪(188)

中国的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	易 纲(194)
利率、通货膨胀预期与储蓄倾向	
——从两次高通胀期间的储蓄倾向看预期的作用·····	宋国青(209)
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上追求增长	
——论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增长与通货膨胀之	
关系 ·····	张 欣(228)
从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	
新发展·····	张维迎(242)
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及我国应采取	
的策略·····	汤 敏(278)
从择优分配原理到一般均衡理论·····	茅于軾(296)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与信息经济学·····	田国强(313)

【附录】

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	
大会上的欢迎词·····	(35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成立	
大会上的讲话·····	(361)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介·····	(364)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演

道·诺斯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仅将对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会对当今世人瞩目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有关。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

供的实验室。

首先,让我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个小点,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起到限制性作用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第一,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第二个论点,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与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第三个论点,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 and 知识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报酬。第四个论点,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第五个论点,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观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

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有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原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该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框架反映了私人性和再分配行为,学习将采取“学习海盗如何做得更出色”的形式。现存的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和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

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弈论中的这两种情况正像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我们必须重新构造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造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必须要做到的是我们必须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我们的正式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构造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政治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决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的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的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运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是马尔萨斯的关于报酬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

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造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代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在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美国的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以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合作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这样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

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随着同这个技术伴生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尽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各种的定级也好,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比如说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团队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工人对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映。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规则、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伎俩,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人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感到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

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灵活应变的可能性。

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仔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结构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仔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所以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新的技术、组织、公司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无处不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两难处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已经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

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尽管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最后,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验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的抉择。另外一点,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我们必须投入比目前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我讲一讲什么没有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